

【黄河三角洲研究】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滨州当代散文的
场域构成及其审美图谱

李盛涛, 耿宝强

(山东航空学院 人文学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滨州当代散文场既是一种实践推论也是一个审美建构,既有共同性又具差异性的地域性审美图谱。一是形成了乡土生活经验和都市生存体验相结合的题材特征:滨州当代散文有鲜明的恋地情结,既有乡村社会历史的纵向反映,也有时代精神的横向把握,且地域文化特征有差异性表现形式;都市经验书写以璁宁和李长英为代表,重在表现内心的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二是具有整体上悲剧性和喜剧性相结合的审美风格:滨州当代散文以悲剧性风格为主,作家的审美表现各有不同;而喜剧性风格主要体现在主体和环境之间的诗意关系,但也失去了一种复杂性和真实性。三是形成了向文学中心位移的两种创作行为:李登建走了一条卡萨诺瓦意义上的“祝圣”道路,且行至最远;而璁宁走了另一种不乏艰辛的创作道路。作为仍在建构中的地域性文学场,滨州当代散文势必在文学实践中越走越远。

关键词:滨州当代散文;文化地理学;审美特征;审美风格;创作行为

中图分类号: DF 93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3.012

“滨州当代散文”绝不仅是一个组合性名词词组,更是一个从物到词的实践推论和审美建构的结果;或者说,它是集文化地理特征和审美艺术特征为一体的合成性名词,且在实践中已形成了一支热爱文学创作、审美趣味相近的散文创作队伍。这一概念中的修饰词“滨州”决定了滨州当代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场权力版图中的位置与地位。概念中的“滨州”不仅仅是一个地级市名称,而是一个关联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文化场域等多种形态的次场域限定。在当代文学场“中心与边缘”权力等级结构视域下,滨州当代文学场处于一种边缘位置,滨州当代散文场亦如此。从文学创作角度看,文学上的滨州既是一个由无数个文学创作实践组成的建构物,也是一个

充满浪漫色彩和乐观情调的文学想象共同体。同理,在滨州当代文学场中,滨州当代散文场正在不断建构、强化和彰显着它的本体性存在和文化地理学特征。从后现代主义差异性、多样化并存的思维角度看,滨州当代散文场有着斑驳陆离的地域性审美图谱。

一、形成了乡土生活经验和都市生存体验两大题材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滨州当代散文是历史发展、时代思潮与社会心理的反映,既有对乡土世界历史进程的纵向反映,也有时代精神的横向把握。滨州当代散文作家体现出鲜明的恋地情结,乡土生活及其生命形态成为文本重要的地域性

收稿日期:2024-11-18

基金项目:滨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当代滨州散文的文化地理学研究”(24-SKGH-235);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项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基因式嵌入研究”(M2020035)

第一作者简介:李盛涛(1972—)男,山东滨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E-mail:lixuguang@126.com

文学符码,这在李登建、李一鸣、赵兴国、刘丽丽、张维亮等人的作品中有较好体现。李登建的散文几乎反映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当下历史的整个乡村变化史,从集体时期的劳动场面到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悲剧命运再到进城农民工的都市生存困境等都有所表现,如《台子的光芒》、《齐王一夜》、《最后的乡贤》、《谁偷走了那一地纯银的月光》、《钉在老树上的故乡》、《高楼背后的他们》等作品;而其他作家也有反映,如李一鸣的《一个人的创业史》、赵兴国的《牛命》、刘丽丽的《最后的麦田》、张维亮的《老树的乡愁》和《消失的“老舟”》。其中李登建的《齐王一夜》可为代表,作品写齐王村曾经在抗战时期是有名的“男女老少上阵杀敌,全村没出一个汉奸”^[1]的“堡垒村”;如今面对村庄拆迁,有十三户村民做了钉子户,尽管他们表面上看似十分团结,但内地里互相提防、互相猜疑,钉子户小旺时常爬到梯子上通过山墙上的“瞭望孔”来观察别人是否出卖小团体而突然搬走。被拆除的齐王村,就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被攻城略地的乡村缩影,传统意义上的作为作家灵魂归宿地的村庄早已不再,世道人心、乡村伦理也已土崩瓦解。这类散文题材实则体现了本土性与现代性冲突的时代文化命题,滨州当代散文作家显然站在了古典、怀旧的本土性文化立场,对当下乡土世界的命运表达了担忧与关切,并对以城市化进程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表现出疏离与拒绝。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批判与反思恰恰是一种文学现代性品格的体现,这也是滨州当代散文的社会价值所在。

在具体创作中,不少作家写到乡村建房事件,如李一鸣的《妈妈的建房大业》、刘庆祥的《老宅》、盖建红的《房子》等作品。在乡村,对于农户而言,建房是一件非常严肃、神圣、艰难甚至具有史诗性质的重大事件,在不同作家的乡土记忆和生命印记的书写中,建房往往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内涵与审美图谱。刘庆祥的《老宅》写了老家的房屋建造史,从第一代房子爷爷住的窝棚到第二座土坯房再到第三代红砖土坯房,刘庆祥将童年记忆、苦难生活、父母的生命衰老、情感归宿与精神寻根等复杂情感融入其中。作品最后写道:“‘老宅真有灵魂吗?’我又想起了父亲的话。”^[2]而李一鸣的《妈妈的建房大业》和盖建红的《房

子》有审美独特之处。李一鸣的《妈妈的建房大业》写父亲远在东北煤矿工作,母亲以柔弱之躯承担起了艰苦的建房大业:一边是母亲为建房精打细算,赊鸡、养猪、养兔子、种梧桐树、割野生红柳编筐、卖柳编,送掉偷吃鸡蛋的小狗(尽管小狗对“我”有救命之恩),以劳折资换取建房用砖;一边是外界的无理阻挠,邻居奶奶对“我”家的指桑骂槐,邻居爷爷“老猫猴子”往“我”家院子里扔砖头、欺辱父亲、在集市上用改锥刺伤母亲;队里在分牛肉时唯独落下“我”家,“我”被管理员驱赶不能像其他小孩子那样争抢到队里大锅中的牛肉汤,就因大黄牛死在“我”家。很多时候,母亲为宅基地不得不屈辱地活着,她给队长一家做鞋;让大哥和“我”去队长家挖粪坑。其间,建房大业还因为妈妈生病和去看望几千里之外因矿难受伤的父亲差不多花光一年的积蓄而一度受挫。初中放学后,当“我”去窑厂找母亲时,作者李一鸣写道:“我跑到妈妈跟前,妈妈正在和泥,她的眼角、耳蜗、脸上的皱纹里积着灰黑的尘垢,头发上像落满了暗霜,嘴唇爆了皮,一笑,牙齿上也沾着土,扑扑吐出两口唾沫,带着泥和血丝。月蓝的褂子、黑裤子上,到处是干白的或湿黑的泥点子。”^[3]这里,李一鸣用看似冷静、舒缓、短促的语言对母亲的形貌进行粗笔勾勒,他压制着内心情感的巨大狂澜,让散文在表面语言的节制、简约和内心深层情感的丰沛、热烈之间构成审美张力,具有震撼心灵的阅读效果。作品中,李一鸣将母亲置于被排挤、被欺辱的生存境地,充分表现出母亲的坚韧与顽强,使母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农村妇女精神谱系的代表。而盖建红的《房子》写母亲晚年因房产问题而产生的母女矛盾和生存恐惧。文章先纵向铺垫写母亲对房子深厚的独特情感,早年的老房子是地主家的,晚上动静不断,用村里民兵连的机枪才能镇得住各种声音。当母亲梦中一位白衣老者把房子的钥匙交给母亲后,老房子晚上才得以安宁,于是母亲坚信自己是老房子的主人。后来,在老房子的地址上又盖起了新房子。其间,母亲与暂居娘家的二女儿一家温馨相处,但在农村拆迁旧房换新房的事件中,母亲无法接受二姐夫想取代母亲成为新房房主的想法。作品写道:“我知道,这个村子,这所房子,是她情感的依托,灵魂的归宿。老

娘的愿望很简单,简单到令人心酸:房产登记簿上有她的名字,村里有属于她的窝;活着有地方可想,死了有地方发丧。”^[4]在这两篇作品中,女性与房子之间构成了意义复杂的转喻关系:女性从一个生命意义的女娲式创造者形象转变为一个家庭的守护者,房子也被深层地转喻为一个更大“子宫”,承载着家庭的安宁、幸福与未来。相较而言,李一鸣赋予母亲形象女娲般艰苦卓绝的创世纪般的精神内涵,更具有神话形象的悲壮色彩;而盖建红则写出了晚年母亲面对房子所有权被家庭其他成员觊觎后的内心恐惧与痛苦挣扎,更有着某种“失乐园”的悲凉意味。在这些作品中,“房子”俨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形成,承载着作家深厚而复杂的情感表达:“房子”不仅勾连着作家对过去乡土生活的疼痛记忆,也是农耕文明长期形成的悲剧性的生命形式和生存方式的具象表达。

对于乡土生活的地域性书写,滨州当代散文作家有着不同的文学选择和审美表现。有作家致力于自己文学故乡的审美营造,如李登建意图建构他的文学故乡“梁邹平原”^[5],并意在表现一种“平原精神”^[6];有作家善于表现具有民俗性的乡村生命形态,如孙光新笔下对木匠、石匠、泥塑艺人以及砖窑、木炭画、地毯编织、柳编、油作坊等生活方式的书写(《真实的、幻象的细碎背景或者细节》);有作家将具有地域文化标签式的人与物写入作品,如李登建笔下的梁邹平原、青龙山、杏花河、乡贤郭连怡等(散文集《血脉之河的上游》),米兰文化散文中的醴泉寺与范公祠(《醴泉》)、梁漱溟(《郑重如实梁漱溟》)、伏生(《一部书的留传》)等,李宗刚笔下的黄河(《我的黄河情结》),李风军笔下具有城市地标性的景区“中海”(《在蓝色的中海湖畔》),赵京城笔下的黛溪、黄河、小清河(《我的河》),苑小红笔下的冬枣林(《雾幻》),赵梅红笔下的麻大湖(《亲近芦苇》);还有的作家将地域方言写入作品,如李一鸣笔下的“划捻儿”、“齁咸”、“私孩子”、“刚着香”、“待承”、“木滋蜡味”等方言(《妈妈的建房大业》),赵兴国文中的“捏嘴”、“盖垫”、“上赋”、“滚团子”、“乱”棉花桃子”、“腕袖”、“刷冷堂子”“刷机”等(散文集《远方亦或是脚下——一位乡村教师的情思》)……可以说,这些具有鲁北平原最原生态

的物象特征与地域文化符码,构成了滨州当代散文地域性的审美标识物,成为作者创作中不可磨灭的地理基因。

除乡土生活体验之外,还有部分作家更关注当下都市的生存体验。都市生存体验并非具有明显的文化地域性,但它作为差异性、多样性的文学形态与乡土题材的散文一样丰富着滨州当代散文场。在都市生存体验书写方面,代表性的作家是璎宁和李长英。璎宁的文学体验是典型的城市体验,其关注点始终是跳动的、多元性的,《玫瑰刺》可谓代表。作品写“我”因一场轻微的车祸导致左肩疼痛,疼痛像潜伏的一根“刺”,“在我通向城市深处的道路上布设了一道隐形的障碍”。^[7]璎宁所表现出的生命形态类似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悲剧主体:对自己的世俗气有清醒的认知与批判,却从不打算拒绝世俗,甚至邪恶地和世俗社会同流合污;她深感卑微,把自己和一个倒腾卖菜的“傻子”比较,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卑微的“北方的蝼蚁”,却又时常为自己作为作家“在尘世里有独立精神的人”而沾沾自喜;想找庸医理论,庸医已搬离而去;做锦旗想感谢良医,良医却不知所踪;她敏感而诗意地探究一束束鲜花的背景、来历和生命特征,却又意淫着男医生对自己的非分之想;她虽在都市中有一席之地,灵魂却始终处于无法安放的飘零状态……璎宁散文中的生命主体是自相矛盾、互相嘲讽、相互搏杀的,理性与感性、悲剧与荒诞、诗意与世俗的生命体验等悲剧性生存体验难以弥合地共存于文本之中。而李长英的散文则聚焦于自我精神世界,远离故土的异乡人心态和对城市生存的疏离,使李长英处于精神的痛苦、孤独之中,其中《静街》可谓代表。作品写自己有夜深人静眺望都市街道的习惯,实际是一种孤寂的心灵独语状态。“一个人走去了,又一个人走去了……他们将走向何方?温柔乡还是绝情谷?生意场还是憩息地?肉体的放纵还是心灵的皈依?死不悔改还是回头是岸?是夜的深处还是黎明的序幕?夜的街道同样具有多种走向,多种走向提供多种选择和结果。他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尽管对每一路过都注目迎送。在他的意识中,不管走向何方,只要行走在夜的街道,就必定有着某种深邃或某种精微。特别是那些低首垂眉、独自迈着缓

慢而坚定的步子的人,不是为百姓的生计忧烦便是为上帝的问题沉重。或者认真思索着灵魂问题。他认为人应该有灵魂,因为有了灵魂末日的审判才能落到实处,否则众多的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报应。他也认为人应该关心灵魂,像禾田除草、林木剪枝那样,可以疏落,却不可以辍止。否则灵魂便将蒙尘积垢,在欲求的侵蚀下丧失本性,最终变得卑微琐碎和肮脏不堪。”^[8]李长英并不关注外物,也不去过多描摹,他注重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苦苦追寻与深思。李长英更像一个都市“零余人”,在物欲中寻求诗意,在喧嚣中固守宁静,虽身处都市而灵魂拒绝认同;他既有隐逸之情,又有困兽之姿;对都市生活的拒绝、批判、反省与追思使他具有一种反现代性的文化立场,体现了一种精神的孤独、深刻与高贵。

二、整体上具有悲剧性和喜剧性并存的审美风格

滨州当代散文创作普遍体现出一种悲剧性审美风格。当然,在这种审美共性选择背后也突显着作者的创作个性:李登建、刘丽丽、张维亮等都试图将当下乡土世界的悲剧命运和个体生命的悲剧性进行重构,但李登建笔下的人物更多是乡村底层边缘群体,更带有一种悲剧的普遍性;刘丽丽将这种悲剧置于一种细腻、唯美、诗意而明艳的女性笔触之中,让乡村的悲剧命运在自然之美的巨大审美张力中加以突出体现;张维亮在表现这种悲剧时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社会的嘲讽与批判。对于伦理视野内的家族人物(特别是父亲、母亲)形象更有不同塑造:李登建笔下的祖父、父亲、大哥等形象是具有悲壮色彩的“硬汉”形象(《血脉之河的上游》);张维亮笔下的父亲则是以血肉之躯抵抗艰难生存环境的悲壮之士(《雪·血》);赵兴国则把父亲象喻为勤劳、善良、对土地念念不忘的“耕牛”形象(《牛命》)。此外,还有杨光军《老爹是一座山》、初守亮《与父亲别离》等作品用情很深,也可圈可点。在这些乡土题材的散文中,作者以悲剧形式写出了自己对父辈的怀念、赞美、膜拜之情,并借此表达自己作为“地之子”对乡土世界的情感认同与精神归属。

同样是悲剧性审美风格,以都市题材为主的

滨州当代散文则表现出另一种审美倾向。如果说乡土题材的滨州当代散文更多是表现他者形象的悲剧,而都市题材则更专注作者主体自身的悲剧体验。当然,这种自身悲剧性体验也各有不同。璎宁的主体意识非常复杂,她总是在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世俗与高贵、追问与自嘲之间乐此不疲地来回游走,她更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嘲讽的戏谑笔调中有着对社会底层的深切关怀。当然,璎宁除了将悲剧性的笔触探向自己灵魂深处之外,还喜欢将视野聚焦于都市底层群体。如《同命鸟》,写菜市场来了一对小矮人(侏儒)夫妻,他们的到来让“我”瞬间滋生出同情心和优越感,甚至自我圣化为他们的救世主并常常帮助他们,但这些仍掩盖不了“我”偷窥他们夫妻生活的卑劣心理;当“我”转让花店打算进入一种自以为高雅的写作生活时,小矮人夫妻依然坚守摊位顽强地生活着,于是“我”顿感被生活打败。璎宁将自身主体的悲剧性体验和他者底层的悲剧性生存体验相结合,既获得了一种悲剧的深刻性与精神性,也具有了一种时代性与现实指涉性。而范红霞的痛点在于婚姻带给她的对自身、爱情、婚姻、生活与生存的追问与思考,在急切诉说与追问中对自己进行大胆的袒露与剖析。更重要的是,范红霞散文中流露出浓郁的、自发的女性意识,使其对内心世界的书写更加真实、坦诚和幽微。她在《不过是一个女人》中写道:“天有阴晴,月有圆缺,每一个朝代的暗夜里、每一寸光阴的闪烁中,都有女人的笑和泪。当周围开始变得光怪陆离时,还有哪个女人敢用单纯来应对?在缤纷复杂的环境里,连‘美女’一词也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当被称为‘美女’,谨慎的女性常会在瞬间里思索是否自己真的享受到了礼遇,毕竟有些夹杂着嘲讽,有些是早已为其预设好的陷阱,还有些不过是人们说惯了的口头语……美丽,成了上帝给女人出的难题;单纯,成了女人最无力的‘保护伞’。”^[9]这里,范红霞将从女性的个体悲剧提升到对女性整体悲剧的思索,并对女性的困惑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倘若无德无能,不如悄然游离于社会的缝隙里,享受生命的寻常与本分,付出应付的努力,收获被适当认可的成功,保护着那颗渺小而高傲的心不被庸俗。来到这世界,你——不过是一个女人……”^[9]相

较瓔宁与范红霞两位女性作者而言,李长英对主体悲剧意识的书写上升到一种精神层面甚至哲理层面,更多表现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孤独与痛苦。

除多数作者选择悲剧性审美风格外,也有少数作者选择喜剧性审美风格。所谓喜剧性审美风格,是指那种更多以审美怀旧的目光关照乡土并倾向于用诗意语言进行表达的文本审美取向。王其槐、苑小红、徐海霞、成娜、杨玉美等人可为代表。王其槐往往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诗意地书写故乡风物,他喜欢调动热烈奔放、色彩鲜明的词语,满怀一种乐观、浪漫、宏大的情感对物象极尽修饰,将自己鲜明的主体情感嵌入所写对象之中(《陶醉在黄河的臂弯里》)。而苑小红、徐海霞、成娜、杨玉美等人有着审美共性:她们并不深究生活的苦难与悲剧,而是在对生活印象式的书写中进行诗意的抒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庄悦新的《南园子》,作者回忆小时候的南园子:种满了各种树木和花草,有各种飞鸟和昆虫、找不到窝的小蚂蚁、会蜕皮变美的蛇、叫声如人咳嗽的刺猬,还有用凤仙花染指甲的姐姐,在园中的吃花生、串树叶……庄悦新将童趣、自然、亲情、启蒙与哲理等丰富复杂的意蕴融进一种诗意、活泼、明快、清新的语言之中,将童年乐园“南园子”营造为一个诗意盎然的心灵乐园。当然,也有作者跳出了悲剧性或喜剧性的审美范畴,在一种自然、舒缓、内敛而不乏思辨、睿智的语言中写出了对故乡风物的独特生命体验。例如李宗刚的《我的黄河情结》写对黄河的敬畏来自童年对黄河决堤的恐惧,作品既有对黄河村民“永不妥协的抗争精神”的歌颂,也有对黄河“桀骜不驯”、“自由自在”精神品格的赞美,更有对自我的批判与反思。作品最后写道:“在我的心中,黄河是一条富有生命的河流,她既塑造了我的性格,也承载了我的生命体悟。”^[10]这里,作者在“人—地”关系中将故乡的黄河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精神品格进行了同构处理,诠释了故土和个体生命的精神关联。

总之,滨州当代散文不同风格的审美选择体现着作者对生活本质的不同诠释。就悲剧性风格的散文而言,原本复杂多样具有巨大阐释空间的生活被认定为一种一元性的、悲剧状态的生存

空间,从而生活中固有的苦难、悲情、磨砺、坚韧等精神要素被放大与突出。日常生活作家笔下被置换成一个具有仪式化的生命祭坛,上面站立着一个个即使形象不够高大但也在道德、精神层面可圈可点的父老乡亲,乡村凡俗人物便被艺术圣化了。于是,作者以“地之子”的颂歌者身份满怀一颗伤怀、感恩、虔诚甚至膜拜之心写他们,巧妙地打通了作者自身与祖辈生命形态的关联,诠释了“我从何来”、“我又魂归何处”的思索与追问。但叙述人伦理视角的单纯与狭隘使其作品无法从人类学角度书写出亲人的复杂人性,更鲜有触及他们的道德缺陷与人性丑陋。从这点来看,以悲剧性为主的滨州乡土题材散文在获得深刻性与沉重性同时,却失去了一种复杂性与多样性。而在城市题材的悲剧表达中,不少作家从他者悲剧的书写转向自身悲剧的展现。相较于乡土题材而言,在都市悲剧性生存体验的散文中作者的生命意识更为突出,这类散文获得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深度模式。当然,有些作品在挖掘主体生命意识的同时,没有很好地聚焦外部生活,导致作品在获得深刻性时又失去了一种广阔性与指涉性。相较而言,瓔宁的创作避免了这类局限,其作品中酣畅淋漓的自我生命意识往往通过社会底层的他者悲剧形象来表现,这让瓔宁的散文尖锐而不失厚重,细腻而不乏坚硬。同样,那些喜剧风格的散文把生活本质视为一种和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存在,这让部分作家切断了和生活的真实生存体验,在较为单纯、明朗的审美关照中表达对生活与时代的赞歌,但也失去了一种深度和硬度。

三、滨州当代散文向文学中心位移的不同创作道路选择

滨州当代散文作为地域文学,在当代文学共同体的文学版图处于边缘位置。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曾说,文学世界共和国存在一个虚拟的“文学的格林尼治子午线”,“可以量出所有属于文学空间的成员离中心有多远”。^[11]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也存在类似的“文学的格林尼治子午线”,可借此推测地域文学与文学中心的美学距离及其在当代文学场中的权力位置。文学场是一个等级结构的权力场,作为次场的地域文

学场也是如此。于中心文学场而言,地域文学场显然处于边缘位置;而就地域文学场而言,其本身也包含“中心与边缘”等级结构。地域文学场的权力位置既决定了它久居边缘位置的惰性与牢固性,也存在着试图挣脱边缘位置、向中心位置靠拢的冲动与野心。正如卡萨诺瓦认为,地域文学被文学世界中心认可的过程叫作“祝圣”。也就是说,地域文学有着向文学中心位移的心理动力和实践行为。由于身处中国文学版图的边缘位置,这决定了地域作家“祝圣”道路的异常艰难,他们往往具有复杂的创作心理及其动机。一是地域文学的祝圣行为给作家创作心态带来复杂影响,其中积极影响是能让作者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创作动力,能不断提升作者的创作水平,客观上推动作家向文学中心挺近;而消极影响是滋生一种创作焦虑,表现为作者往往不能潜心创作,或迷恋于文坛世俗权力的争夺,或热衷于参加各种文学征文大赛,甚至形成一种“征文体”写作模式。二是久居边缘位置给作者创作心态带来的复杂影响,其积极影响是体现为作者的一种创作上的隐逸、虚静、固守本真的创作心态,能真正提升作者的创作水平;而消极影响是让写作者产生一种自卑感,或表现为缺乏创作热情并导致创作行为中断,或表现为缺乏艺术提升动力致使写作成为一种惯性的自我宣泄。当然,这两种心态并非截然分开,可能成动态平衡的状态共同存在于一个作者的创作心理当中。就滨州当代散文而言,李登建和璎宁可以说是具有积极创作心态又各具不同审美选择的散文作家。

在一定意义上讲,作家李登建是在文学“祝圣”之路上走得最远的一位。李登建大学中文系毕业,有过8年大学中文专业写作课的授课经历,有着系统的文学专业知识结构,也熟知写作原则,后在市作家协会任作协主席17年。他的散文曾获得齐鲁文学奖1次、泰山文艺奖3次、精品工程奖3次。2016年11月,李登建被省作协推选为山东省作家代表,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这些文学成绩和实践充分体现了李登建在散文“祝圣”道路上的披荆斩棘和所行之远。可以说,李登建散文的整体创作水平和创作成效都远远走在了滨州其他散文作者前面。从其长期的文学“祝圣”行为来

看,显然李登建已经形成了与文学中心的话语机制更加契合的叙述形式,散文《血脉之河的上游》可为代表。其一,文本具有文学中心所求的意义深度模式。作者写“我”和祖父在长相(“祖父眉粗黑,我的眉也粗黑;祖父唇厚,我也唇厚;祖父背上有一颗红痣,从我背后或肩膀上也能找到差不多的一颗;前些年我走路还不歪身子,可过了五十岁,竟也像祖父那样一肩高一肩低了。”^{[12]5})、性格(“以我和哥哥的人品、性格推测祖父,他应该是一个正直、善良、厚道、本分、勤劳、节俭、不善交往、要面子的人,也是那类不服输、打碎牙往肚里咽的硬气汉子。”^{[12]5}),甚至生活行为(祖父晚上睡不着到村里拾牛粪/我深夜失眠后进行创作)等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作者借此表达对祖辈的精神认同和对生命遗传密码的揭示,并隐喻着中华民族古老的祖先崇拜和生命起源的文化意义;而大哥、祖父虽身处生存困境却依然坚韧不拔、善良淳朴的“硬汉”形象与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老百姓甚至是国人的文化人格想象相一致。所以,这篇散文的意义阐释空间契合了中华民族精神与当下国家意志的价值诉求。其二是散文语言的严谨与克制。从作品语言来看,李登建的散文既通俗质朴又有诗意,既看似简单无心又实则精心雕琢,他的散文语言复杂而充满审美张力。从叙述伦理来看,李登建始终将主观态度控制在一种由“德性、审美、人性”所构成的被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合理区间之内:对乡土世界中亲人和其他生命形式多进行合乎道德的审美观照,较少专注他们身上的道德缺陷,即便是对人性的揭示也严格控制在伦理合理性之内。同时,李登建的批判与反思更多指向自己,这种自我批判使文本获得了一种深刻性,但这种自我批判多停留于时代发展投影于内心感受的困惑与纠结,尚缺乏对自我人性的深层次与复杂性的揭示,更鲜有对自己人性之丑的大胆披露。或者说,李登建散文中叙述人的外在身份是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气质近乎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古典和优雅,这使李登建的散文语言始终保持一种德性叙述,从而让他的散文更契合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一贯的审美规范与修辞表达。

而女散文作者璎宁却是另一种文学创作之

路,一条“祝圣”异常艰难的道路。璿宁没有上过大学,也无中文专业的系统知识结构,这种知识背景的空缺让璿宁早期的创作既多了摸索性,又时常因不守规矩而获得可贵的创新性。很长一段日子里,璿宁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干过一天六元钱的家属工,在做家属工期间,她修剪过草坪、捡拾过垃圾、下过大田、扬过大粪、杀过猪、背过化肥;做过纺织工;当过会计;在肉联厂做过车间工人;干过9年的幼儿园老师;做过16年鲜花店老板(2024年,她关闭花店,进入一种专门的书斋式写作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她的创作而言是助益还是滞涩,目前尚不能妄言!)尽管璿宁于2020年任市作协副主席一职,但这种地域文学场权力中更具形式象征意义上的位置获取,尚不能磨灭她长期在地域文学场边缘位置所养成的坚韧和凝神静气,或者说,她的本身经历就体现着一种很好的隐逸、虚静与守真的创作心态。更重要的是,璿宁没有在创作中把叙述人预设为一个特定身份的人(比如惯常的知识分子身份),有时她看上去像知识分子,凭着她多年的养花经历,借花说事,搞点儿浪漫与抒情,恣肆时甚至有点儿小资情调;有时又像一位满身烟火气的市井女人,最让人拍案和动情的地方,就是她在作品中欢快地撩起衣襟露出小市民的乖张与狭隘,甚至津津乐道于自己人性丑陋与劣根性的时候。例如她在《同命鸟》中,一面写自己对小矮

人夫妻的关爱,另一方面又袒露自己隐秘而卑劣的心理。作品写道:“我一直很想探究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体构成,比如颅骨也是二十九块、四肢骨也是一百二十六块、躯干骨也是五十一块吗?他们的心有多大尺寸?女人的乳房高耸吗?卵巢和我的有啥区别?再比如他们如何相亲相爱生儿育女?可当看着他们如其他商贩一样,忙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时,觉得自己有点‘卑劣’。”^[13]璿宁是敢于、乐于对自己及其人性举起屠刀的人,这使其散文创作异常大胆、泼辣和坦诚。所以,这造成了璿宁散文中作者主体生命意识的异常丰满、深刻与复杂。可以说,单从自我生命意识的塑造与揭示来看,滨州当代散文其他作者尚无人能及璿宁的创作。

总之,滨州当代散文作家以各自不同的审美选择和文学创作推动着滨州文学的发展。那些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散文,它们以地域审美名片的形式丰富、强化、突显着滨州文学的文化地理特征;而那些地域色彩并不突出的散文创作者,以自身的创作行为充实、建构着滨州当代文学场。作为地域文学,不管哪种审美选择,它们都在强化自身地域审美风格的同时,也在积极孕育着一种文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正如鲁迅所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那样,滨州当代文学场域的疆界可能越来越宽广,在文学“祝圣”的道路上亦越行越远。

参考文献:

- [1]李登建. 齐王一夜[M]//李登建. 血脉之河的上游.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
- [2]刘庆祥. 老宅[M]//刘庆祥. 大河归处.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
- [3]李一鸣. 妈妈的建房大业[J]. 十月,2024(5):110-117.
- [4]盖建红. 房子[J]. 散文百家,2020(1):103-107.
- [5]李盛涛. 梁邹平原:文化地理学意义上李登建的文学故乡:兼论散文集《血耐之河的上游》[J]. 百家评论,2024(1):38-43.
- [6]房伟. 平原精神:“内爆”的美学张力与厚重的艺术世界:李登建散文创作论[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13-24.
- [7]璿宁. 玫瑰刺[J]. 十月,2019(3):134-143.
- [8]李长英. 静街[J]. 山东文学,1993(9):66-67.
- [9]范红霞. 不过是一个女人[M]//范红霞. 谁是等你的那面墙.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
- [10]李宗刚. 我的黄河情结[J]. 青岛文学,2023(3):74-76.
- [11]帕斯卡尔·卡萨诺瓦. 文学世界的共和国[M]. 罗国祥,陈新丽,赵妮,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2]李登建. 血脉之河的上游[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
- [13]璿宁. 同命鸟[J]. 散文选刊,2024(10):52-57.

The field composition and aesthetic map of contemporary prose in Bin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y

LI Shengtao, GENG Baoq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prose field in Binzhou is both a practical inference and an aesthetic construction, with a fragmented aesthetic map. One is the formation of a thematic feature that combines rural life experience with urban survival experience; contemporary prose in Binzhou has a distinct love for the land, reflecting both the vertical history of rural society and the horizontal grasp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ave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Urban experience writing, represented by Ying Ning and Li Changying, focuses on expressing inner life feelings and survival experiences. The second is an aesthetic style that combines tragedy and comedy as a whole; contemporary prose in Binzhou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a tragic style, and writers have different aesthetic expressions; the comedic styl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po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environment, but it also loses a complexity and authenticity. The third is the formation of two creative behaviors that shifted towards the center of literature; Li Dengjian took a path of “consecration” in the sense of Casanova and traveled the farthest; Yingning embarked on another path of creation that was not lacking in hardships. As a regional literary field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contemporary prose in Binzhou is bound to go further and further in the literary practice of “consecration”.

Keywords: Binzhou contemporary prose; cultural geography;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esthetic style; act of creation

(责任编辑:周新颜)

引用格式 李盛涛,耿宝强.文化地理学视域下滨州当代散文的场域构成及其审美图谱[J].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42(3):86-93.

LI S T,GENG B Q. The field composition and aesthetic map of contemporary prose in Bin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2025,42(3): 86-93.